

21世纪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系列教材

美国的 新闻媒介批评

Meiguo de
Xinwen Meijie Piping

谢 静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系列教材

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

谢 静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谢静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

(21世纪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09805-0

I. 美…

II. 谢…

III. 传播媒介-批评-美国

IV. 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5472 号

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系列教材

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

谢 静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28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3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83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系列教材”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依照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和研究生学习的特点,结合市场需要,倾力推出的一套全新的系列教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得到了长足而迅猛的发展。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状况,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超过 10 个院系,每年毕业生总数不足 400 人发展到现今 878 个新闻传播类的专业点,专科、本科以及硕士、博士研究生等的多层次教育,在数量、质量以及层次的丰富性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新闻传播学的快速发展在不断呼吁高水平理论成果的涌现,而日益壮大的研究生队伍也召唤着高水平教材的出版,“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系列教材”在此形势下应运而生。

本套丛书的特点之一是注重理论建设和新领域的开辟,力争做到理论有建树,观点有创新,避免低层次的重复,与一般本科教材相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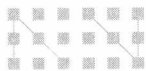
特点之二是不过分拘泥于以往教材的模式,充分考虑研究生读者层次的特点与需要,在展现作者多年来独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的同时,力求开放性与引介性,努力为读者开辟一个广阔的学习与研究视野。

特点之三是经典理论研究与交叉学科研究兼收并蓄,既有新闻理论、新闻报道、新闻专业主义等经典问题的新演绎,又有传媒文化、媒介批评、传播研究方法、传媒体制比较等交叉领域的新探索。

另外,本套丛书的作者中既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各著名新闻院系的学科带头人,也有海外学成归来、中西兼收的青年新锐,相信可以较好地满足各校研究生教学的需要。

本套教材的出版得到了国内多家新闻传播院系老师的大力帮助与支持,在此深表谢意!同时,也希望广大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生以及新闻界同仁对丛书的不足之处提出宝贵建议,以使该套教材能够不断修订和完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矛盾的叙事

——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性质 /9

第一节 媒介批评与叙事 /11

第二节 作为叙事的媒介批评与科学研究的区别 /15

第三节 作为叙事的媒介批评与科学研究的联系 /17

第四节 批评叙事的道德评价与标准 /19

第五节 叙事与媒介批评研究 /22

第二章 没有控制的管理

——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主体 /25

第一节 内外之争 /25

第二节 媒介批评：制度化的尝试与困境 /36

第三节 媒介批评：公众的责任？ /53

第三章 协商规范

——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交互发展的历史 /67

第一节 专业主义：对抗商业主义 /68

第二节 客观性原则：专业范式的建构 /79

第三节 社会责任论：规范的修补 /89

第四节 公共新闻学：规范的补充 /98

第四章 社会期待与拯救的想象

——美国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批评 /113

第一节 真实与幻象——新闻媒介政治角色批评 /115

第二节 艺术与娱乐——新闻媒介社会—文化角色批评 /133

第三节 诱惑与救赎——反思媒介批评的神话 /159

第五章 谁能决定新闻 (一)

——美国新闻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167

第一节 媒介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167

第二节 媒介垄断与唯利是图的社会政治后果 /178

第六章 谁能决定新闻 (二)

——美国新闻生产的社会组织网络分析 /201

第一节 组织常规与限制 /202

第二节 新闻记者与新闻来源 /226

第七章 谁能决定新闻 (三)

——美国新闻生产的文化批评 /246

第一节 新闻价值与意识形态霸权 /247

第二节 作为文化形式的新闻：基本要素分析 /255

第八章 对错之间

——媒介的伦理道德批评 /269

第一节 多元的价值主张与冲突的伦理规范 /269

第二节 新闻采集的伦理问题 /277

第三节 新闻呈现的伦理问题 /294

第九章 建构权威

——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功能解读 /312

第一节 媒介批评：专业权威的建构策略 /313

第二节 媒介批评：专业叙事的组织模式 /321

第十章 结语：共识与歧见 /334

参考文献 /339

后 记 /359



导 言

每一个自由人都是媒介批评家。

在美国，媒介批评的繁荣被视为民主社会的骄傲。《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曾用“千万种声音鲜花般盛开”（Boylan, 2000）来形容其兴旺，报纸、广播、电视、期刊、书籍上媒介批评的内容不计其数，尤其是网络媒介的出现，为批评的公开提供了新的渠道。除了公共空间以外，私人领域的媒介批评更是数不胜数，客厅、厨房、咖啡馆、足球场、出租汽车……到处都能听到人们对媒介的批评。可以说，媒介批评无所不在。

然而，与媒介批评的繁荣相比，美国有关媒介批评的研究却屈指可数。早在1983年，当帕特里克·J·戴利（Patrick J. Daley）着手研究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媒介批评家时，曾感叹道：“新闻媒介批评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然而，在有关新闻媒介的研究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被忽略了。”（Daley, 1983）20多年过去了，这一状况并未有太大改观。

美国媒介批评研究概况

美国较早进行媒介批评研究的学者当推李·布朗（Lee Brown）。1974年，其著作《不情愿的改革：论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的出版具有开创性意义。但由于该书篇幅较小、论述深度有限，有待开拓的领域还很多。

帕特里克·J·戴利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博士论文《20世纪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激进趋势》中，但该论文未能正式出版。T. 戈尔茨坦（Goldstein, 1989）编撰的《谋杀信使：媒介批评100年》搜集了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批评文章，为进一步研究媒介批评提供了资料。J. B. 莱莫特（Lemert, 1989）的《批评媒介：经验主义方法》总结了经验研究对媒介批评的贡献。J. 詹森（Jensen, 1990）的《拯救现代性：媒介批评中的矛盾》以独特的视角梳理了美国媒介批评中的一些主题，M. T. 马尔佐夫（Marzolf, 1991）在1991年发表的《文明之声：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1880—1950》中对媒介批评70年的历史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回顾，这两本书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作为教材，P. B. 欧利克（Orlik, 2001）的

《电子媒介批评：应用的视角》强调应用性，理论性较弱，而且囊括了电子媒介，包括电视剧、谈话节目等，同新闻内容直接相关的批评则比较有限。1993年，K. B. 诺辛顿（Northington, 1993）的博士论文《作为专业自律的媒介批评：对美国新闻学评论的研究》从专业自律的角度审视了美国的新闻学评论，对媒介批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似乎也未公开发表。还有一些研究散见于各种专业期刊，如《大众传播批判研究》、《大众传播媒介伦理杂志》、《新闻学与传播学季刊》，等等。上述这些研究对于了解和研究美国媒介批评的历史与现状大有裨益，但相对于范围如此广泛、数量如此庞大的媒介批评本身来说，仍嫌不够，解释乏力。

P. F. 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 1948）在分析媒介批评研究的缺失现象时认为，这主要归于两个原因：一是新闻媒介批评的对象对批评的抵制，使得针对媒介批评的研究缺少合法性基础；二是学术研究领域对媒介批评的轻视，使得针对媒介批评的研究缺少学术性基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拉扎斯菲尔德的解释仍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一方面，很少有媒介或有媒介捐助的基金会愿意资助批评自己的研究项目，除非这一研究能够带来即刻的效益和利润；另一方面，这也与媒介批评内容的庞杂、方法的多样性有关，科学地梳理、整合如此参差不齐的批评文本，的确是一个难题。而且，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日益向社会科学靠拢的新闻传播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实证的方法和理论的建构，媒介批评这一现象似乎既无益于某一理论的增长，也难以套用实证的方法^①，所以，媒介批评不能成为研究的主流，当在情理之中。

但是，现实问题并不会由于研究的缺位而消失，相反，缺位的代价总有一天将由实践界与学术界共同偿付。事实上，美国并不缺乏批评和批评性研究，缺乏的是批评的落实和效果的体现——而这恰恰是研究媒介批评的目的之一。越来越多的批评涌现，既是新问题的结果，也是老问题的积累，同时对所有批评构成反讽：如何实现媒介批评的价值？

因此，对于媒介批评的研究不应当纠缠于形形色色矛盾而对立的媒介批评以及媒介批评与媒介行业的对立之中，那样永远也走不出话语的丛林。我们应该追问：媒介批评在新闻实践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反映了媒介与社会的何种现实？媒介批评是否能够对媒介发展、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要回答这

^① 在美国，有少量有关媒介批评的研究运用了内容分析的方法，考察专业期刊的内容，计算批评所占比例；还有的研究运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媒介批评对从业人员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数量很少、影响有限。

一系列问题,就必须深入考察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其内容与标准,然后评价其成败得失。

本书的基本立场

本书的新闻媒介批评指对大众传媒新闻实践的诠释与评价。批评的主体包括新闻媒介自身,研究媒介的学术领域,作为媒介消费者的公众、社会机构、团体等。批评的对象包括新闻从业人员的活动及其产品。此处的“批评”接近于文学批评中的批评概念,有评断之意,包括了正面与负面的评论,但更多地倾向于负面批评。

在英文中,媒介批评(media criticism)是一个包容极广的概念,有时指对大众传媒新闻内容的批评;有时则包括对大众传媒所有内容的批评,如电视剧、谈话节目、报纸杂志上的文艺作品等;有时甚至还包括所有经过大众传媒发布的批评,即媒介化的批评,如在媒介上对政府、文化、社会现象进行的批评。^①也有学者(参见Brown, 1974; Marzolf, 1991)使用“press criticism”的概念,对研究的范围做了明确的界定。不过,没有人能对上述媒介批评的三层内容同时进行研究,这些内容既不在同一层面,也不属于同一学科和领域。其实,有关后二者的研究在美国已有较长的历史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文艺批评、影视批评和修辞批评等,本书将不涉及这些内容。因此,本书所指媒介批评为第一层意义上的批评,即对新闻媒介实践的批评。

本书把媒介批评视为一种叙事,从批评叙事与新闻专业的关系角度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之所以如此解读,是基于本书对于媒介批评的两个基本认识:首先,媒介批评的首要目的不是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而是促进媒介的改革与发展,使媒介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因此,媒介批评与所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理应成为媒介批评研究的核心。其次,对于媒介批评的研究,不是要参与批评媒介,而是要把握媒介批评现象的实质。

英国学者威廉斯曾经指出:批评“需要被解释为一种具特殊性的反应,而不是被视为一个抽象的‘判断’。在复杂而活跃的关系与整个情境、脉络里,这种反应——不管它是正面或负面——是一个明确的实践”(威廉斯, 2005: 100)。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实践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方面,一些批评

^① 如诺斯坦、布莱尔和杜普兰(Nothstine, Blair and Dopeland, 1994)主编的文集《批评的问题:创造、创新与话语和媒介批评》,就是对所有媒介化的批评从修辞学批评的角度加以研究。

主题反复出现,而被批评的现象却久批不倒、依然故我;另一方面,媒介批评体现的要求与期望,往往相互矛盾、相互对立,令被批评者无所适从。要从整体上把握这表面繁荣、实质喧哗的美国新闻媒介批评,既需要恰当的切入点,又需要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叙事理论和专业主义理论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框架,在解释、评价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方面,体现出独到的力度与效果。

本书所研究的美国媒介批评,主要是指美国学者、公众和新闻从业者自身对于本国新闻媒介的批评,基本上不包括来自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对于美国新闻媒介的批评,也不包括美国人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新闻媒介的批评。不过,在行文过程中,根据相关论题或者对象的需要,偶有涉及其他国家学者的论述。另外,美国的媒介批评者也并非封闭的整体,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传统上,都与西方其他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表现在思想方法、学术传统等方面。因此,美国新闻媒介批评也无法与其他国家的媒介批评截然分开。但是,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由于特殊的环境与问题,美国媒介批评又确实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征,比如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互动,对新闻生产过程中组织因素的重视,等等。

研究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目的在于为中国的媒介批评寻求一种思路。中国的新闻媒介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矛盾也随着经验一起凸显出来,加强对监督者的监督、对批评者的批评,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不可否认,中美新闻媒介在性质、功能、环境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异,对媒介的期望与要求也不完全一致。美国的有些媒介批评所反对的,可能恰好是我们的媒介应当提倡的,比如对新闻自由主义、专业主义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有助于全面、正确地评价我们所提倡的理念,以扬弃的姿态吸收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有关理论与实践。另外,有些媒介批评指出的问题是中美新闻媒介的共同弊病,如市场经济对于新闻业的腐蚀,则可以拿来以为借鉴。因此,我们分析美国媒介批评的性质、历史与功能,首先就是要理解其立场与“利场”,正确、全面地把握媒介批评的观念与理论。其次,美国新闻媒介批评实践的成败得失也将为发展我国的新闻媒介批评提供镜鉴。

本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不打算直接分析美国的新闻媒介及其产品,也不打算纠缠于形形色色矛盾而对立的媒介批评以及媒介批评与媒介行业的对立之中,那样只能陷于具体问题的纠葛之中,永远也走不出话语的丛林。本书把批评实践当做一

种叙事，通过分析叙事者的立场与目的来理解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性质、目的与功能，并根据这一理解，梳理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历史与主题、机制与规范。

本书认为，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批评反映了人们对媒介的社会角色——尤其是在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期望，体现了对媒介作为私产却必须服务公众的要求。同时，媒介批评还是更大的社会叙事的一部分，反映了批评者自身的境遇与立场，而这也正是媒介批评之所以喧哗的一个原因。媒介批评的叙事性要求人们以平等、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它。但是，作为一种社会专业，美国的新闻业又必须树立自己的合法性与专业权威，尤其是当媒介批评持续不断的时候，树立权威的要求更为迫切而持久。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新闻媒介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与其它社会行为者的持续不断的博弈、对话中，协商自身位置、确立统一规范、构建专业权威的过程。

在第一章中，我们根据叙事理论的相关观点，分析了媒介批评的叙事特征；并且通过与科学研究的比较，明确了媒介批评的性质。同时，我们还进一步阐述了批评叙事的道德评价与标准。最后我们认为，从叙事的性质来理解媒介批评，还为我们研究媒介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章题为“矛盾的叙事”，即试图在各种矛盾对立的批评话语中寻找一条通幽曲径。

第二章，“没有控制的管理”，分析美国媒介批评的主体。本书认为，值得重视和关注的话语主体主要有三种类型：新闻界、学术界、公众及其组织。不过，对于媒介批评来说，还存在着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媒介批评的对象本身就是它赖以公开的渠道，在本来应当公平对话的批评空间里，批评主体的权利却极不均衡，媒介批评必须首先协商话语权。应当肯定的是，在美国新闻业迈向专业化的过程中，媒介批评也逐渐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其重要标志就是媒介批评的机制化。这既包括作为自律机制的新闻评议会、内部督察员、专业期刊、专业协会及其道德规范等，也包括来自专业以外的职业批评家、媒介观察和批评组织等。这些机制在监督媒介、批评媒介、改革媒介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面临着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矛盾，其作用不容高估。因此，诉诸公众成为媒介批评的另外一个重点，旨在通过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来提升新闻的专业水平。整体而言，由于美国新闻媒介对于自由、独立的强烈诉求，媒介批评被设想为具有一定管理功能的专业机制，但又因为不愿意受到任何控制，媒介批评面临着主体与空间的多重矛盾和悖论。

第三章，“协商规范”，探讨美国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交互发展的历史。纵观其历史，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对于新闻专业规范的形成具有不可磨

灭的贡献。从19世纪末开始,在对媒介的商业主义和煽情主义的批评声中,专业主义作为一种改进方案,逐渐得到认可,并迅速付诸实施:新闻院系相继成立,专业组织开始组建,伦理规范逐步确立。紧接着,面对利用媒介进行宣传的企图和社会对媒介宣传的激烈批评,客观性原则走进新闻专业主义的中心,逐渐成为其核心理念。客观性规范确立以后,也从来不乏批评之声。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客观性的批评达到高潮,于是,哈钦斯委员会的报告应运而生。社会责任论并不否定传统的新闻规范,仍然视媒介为民主社会的前提与基础:为公民的正确决策提供真实而全面的信息。但是,社会责任论把责任加入新闻自由的概念当中,丰富了新闻的专业理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社会的政治动荡中,新闻媒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批评,有外界的抨击,也有内部的反动,但总的来说,在专业规范、专业理念等方面缺乏实质性、持久性的建树。进入80年代以后,缺乏实践的专业理念(如社会责任论)有了新的发展,在对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的双重批评之下,“公共新闻学”(public journalism)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浮出水面。作为一种运动,公共新闻学既获得了哲学的支撑,又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从而被视为专业规范的重要突破。

媒介批评的内容是本书的重点,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媒介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影响,这是第四章的主要内容;二是新闻生产的过程与要素,将在第五至第七章分三章详细探讨;三是新闻实践的道德问题,这是第八章的主题。三者都是从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展开的,不过,媒介的社会角色批评着眼于媒介对社会的功能与效果,反映的是一种社会期待;新闻生产批评侧重于社会因素对于新闻生产的影响,体现了现实的无奈;而媒介的道德批评则反映了具体的新闻实践过程中的矛盾与协调。

第四章,“社会期待与拯救的想象”,从媒介在政治和社会—文化两个层面的角色期待入手,以两组二元对立的预设线索,分析美国媒介批评的内容、矛盾和实质。从媒介的政治角色来看,媒介幻象与再现真实的期待相对立;从媒介的社会—文化角色来看,媒介的娱乐倾向与人们的艺术要求相矛盾。无论是期待真实还是艺术,媒介批评都表达了对于新闻媒介诱惑人民的罪过的恐惧与愤怒,以及对于媒介救赎力量的期待和救赎媒介自身的希望。

第五、六、七章,“谁能决定新闻”,集中分析媒介批评对于新闻生产过程的关注。新闻生产批评关注新闻的社会制造现象,主要回答“选择什么作为新闻、又如何报道这些新闻”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视角,它试图避免笼统地讨论宏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也不只是从媒介文本的

字里行间寻找意义，而是从社会或社会组织的视角切入，观察这样一个独特的节点。具体地说，新闻生产批评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组织网络分析和文化批评。

第五章介绍新闻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新闻生产，并非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主流；这一领域更加深刻、尖锐的批评主要来自英国。不过，少数美国学者在批评美国新闻媒介时，注重从宏观政治经济结构与日常新闻实践的关系角度展开分析，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尤其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美国新闻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媒介的产权集中与寡头垄断，媒介的唯利是图与广告支配，媒介全球化等。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与民主政治、社会共同体和新闻传统等政治、社会和新闻的核心价值密切相关。这些社会政治问题的后果则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威胁民主、分裂社会和侵蚀新闻。

第六章介绍新闻生产的社会组织网络分析，这是美国学者对于新闻媒介批评的一大贡献。这一视角既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批判，也与一些批评者对于记者编辑个人素质的微观分析不一样。它从新闻媒介组织自身及其与其他社会机构和群体的社会关系来解释新闻生产中的诸多问题，因此体现了一种中观的取向。本章主要从两个方面介绍美国新闻生产的社会组织网络分析：一是媒介组织的常规及其限制；二是新闻记者与新闻来源的关系。

第七章介绍新闻生产的文化批评。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新闻生产，意味着追寻并分析决定新闻产品的象征性因素，即哪些象征性因素决定了什么是新闻，以及如何表现新闻。本章主要围绕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来探讨文化的影响：一个是新闻价值，另一个则是新闻的基本要素。

第八章，“对错之间”，分析美国媒介批评对于伦理道德的要求。在美国新闻业发展过程中，为适应新闻性质和组织生产等诸方面的要求，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逐渐形成了采访、写作新闻的一系列惯例。但是，由于新闻业自身专业化程度不高，这些惯例大多以不成文规范的形式出现，在业内也并非普遍被认可。面对具体对象、具体情景，人们常常依据特定的价值主张和伦理规范，采用不同的策略和修辞。再加上西方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多元价值主张和冲突的道德理念，使得媒介的伦理道德批评呈现出极为矛盾与复杂的状况。与此同时，作为一种职业道德的新闻伦理规范，又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公德相冲突，在媒介批评中则表现为各自为政、各说各话、互不相容。本章首先简要介绍指导美国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的主要伦理道德观念，以

及这些观念的冲突与矛盾。然后，分别从新闻采集和新闻呈现两个方面，介绍并分析媒介伦理道德批评的主要问题。

第九章，“建构权威”，解读美国媒介批评的功能。从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进行研究，不可回避的矛盾是：媒介批评促成专业规范，同时又不断挑战、质疑这些规范；新闻业以规范为自身存在确立合法性，同时，又不愿为规范所束缚。在新闻业看来，媒介批评意味着一种社会控制，新闻媒介既反对任何形式的控制（甚至包括自我控制），又不得不依靠媒介批评树立专业权威、构建专业认同。这些矛盾影响了媒介批评的效力，阻碍了新闻媒介的进一步改革。

第十章，结语。面对美国媒介批评的历史与现实，我们的期待也陷入悖论之中：媒介批评的叙事性从本质上肯定了歧见的正当性，但媒介批评要取得效力，又不得不期望达成共识。也许我们的期望也应当是辩证的：正是在共识与歧见之间，媒介批评协商着自身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第一章 矛盾的叙事

——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性质

在美国媒介批评的话语丛林中探索越深入，越能够体会到一种深刻的矛盾性。

第一种矛盾来自批评本身。民主社会的自由批评带来了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繁荣。然而，繁荣的同义词是喧哗，当我们仔细聆听这些声音时，却又发现，它们往往互相对立、互相矛盾。

著名的批评家乔姆斯基和赫尔曼（Chomsky and Herman, 1988）曾撰文指出，《纽约时报》就是“真理报”，二者都充当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右倾批评家则认为，媒介反映了自由主义思想，因为调查显示，美国的编辑记者大多是自由主义者。^①

在反对媒介意识形态偏见的批评家眼中，媒介偏离专业规范（如客观性原则）罪不可赦；而在新闻生产研究者看来，恰恰是这些专业生产常规使媒介成为意识形态控制的帮凶。^②

对于媒介的窄播（narrowcasting）现象，有人欢呼：媒介窄播再生产了特殊的身份认同，从而再生产了小群体的团结；也有人批评：媒介窄播威胁了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因为它所创造的媒介世界过于分化，从而失却了共同经验和共同讨论的可能性。

商业性媒介尤其是跨国媒介，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往往回避矛盾，锁定共同兴趣。支持者鼓吹大同世界的理想，而批评家则抨击这些媒介

① 根据 R. 利希特、S. 罗思曼和 L. 利希特（Robert Lichter, Stanley Rothman and Linda Lichter）1986 年的调查，在全国性知名媒体中，54% 的新闻工作者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17% 是保守主义者，剩下的则走“中间道路”（参见 Schudson, 1995）。

② 如新闻工作者对新闻来源的依赖，导致了“收编”与“共谋”；客观报道的传统与程式，如平衡和直接引语方式，导致了对权威来源的偏爱，从而使当权者在媒介中占有绝对优势（参见罗胥克，1994；Schudson, 1993）。

泯灭了民族文化，使得大众文化大行其道。^①

对于新闻娱乐化现象，批评者痛斥媒介的“堕落”，大声疾呼重建媒介的政治功能；而支持者则欢呼其“草根性”，为其摆脱虚伪的精英主义而叫好。

.....

这些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观点充斥媒介批评的话语空间，不仅可能淹没真知灼见，令人无所适从，而且相互抵消，给傲慢的从业人员以拒绝接受批评的口实，从而对改善新闻传播实践作用甚微。

第二种矛盾来自人们对于媒介批评的认知与态度。一方面，不少人认为：在充斥着对个人或社会机构的批评的新闻媒介上，唯一缺席的批评对象就是媒介自身。1964年，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the Nieman Foundation for Journalism）的负责人路易斯·M·里昂（Louis M. Lyons）也曾指出，缺少对诸如新闻媒介这样重要的机构的坚持不懈的批评，是理智社会责任关系中的一大缺陷（参见 Brown, 1974）。然而另一方面，又有人撰文指出，正是媒介的自曝家丑导致了媒介形象的下降。例如，大卫·P·范（David P. Fan）的统计报告表明，从1973年到1998年的20多年时间里，有关媒介信任度的正反报道都很充分，而且相关分析显示，媒介的自我批评和对媒介批评的报道，是影响人们对媒介信任度的主要来源。因此，新闻媒介成了“自杀的信使”——自己的负面报道损害了自己的公众形象与社会地位（参见 Fan, 2001）。^②

这种对于媒介批评截然相反的观点常常令人迷惑：美国的媒介批评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过多或过少的媒介批评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当然也可以采用定量研究的方式进一步验证这些观点，但无论谁对谁错，从这种完全对立的观点本身即可看出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矛盾与对立，看出人们对于媒介批评的不同解读。

① 如著名的英国学者汤林森（汤林森，1999），对“文化帝国主义”现象进行了雄辩的论述；更有人认为，媒介在“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② 大卫·P·范还研究了社会普查报告（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他发现，此间对除新闻业以外的11种社会机构，公众的平均信任度下降了7%，有的机构持平，有的略有上升，而新闻业在同时期内下降了21%。范认为，如果说是人们的媒介体验导致了信任度下降，那么在一些具体事件中，比如辛普森案、克林顿丑闻等报道时期，信任度应当有较明显的下降，但统计分析没有得出这一结论。相反，对军队和宗教的信任度则明显与个案有关。通过运用复杂的统计分析工具，他相信，新闻媒介是“自杀的信使”，媒介关于自身负面报道的影响比GSS反映的其他社会、心理因素更显著，如代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保守主义思潮、政治疏离感等。

媒介批评的这种矛盾性要求我们必须以批评的态度对待它。媒介批评讲述了媒介的故事，也讲述了批评者的故事。在以那些批评固有的方式认识媒介之前，我们必须“开箱”检验——检视媒介批评者的立场，以及批评背后暗含的预设和预设的依据、基本类型、一致性或矛盾性。因此，对媒介批评的研究就是对批评的批评。

基于这一认识，本书把媒介批评视为一种叙事，一种不同于科学的知识形态。也就是说，本研究基于以下假设：媒介批评不仅仅是人们对媒介的认知与评价，更是批评者的社会与生活矛盾的折射，是批评者对自身境遇的曲折表述。

第一节 媒介批评与叙事

叙事就是讲故事，但不仅仅是讲故事，它是传统知识话语的典型之一。“叙事出现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地方、所有的社会之中；叙事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开始而出现。”（罗兰·巴特，1988，转引自伯格，2000）寓言、神话是叙事，小说、诗歌是叙事，新闻、日常对话也是叙事。现代叙事理论把叙事理解为了解世界和了解自我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洛朗·理查森，1990，转引自伯格，2000）。人们不仅通过叙事来了解世界和了解自我，也通过叙事来讲述自己对世界的理解。

在进行媒介批评的时候，批评者向世界表述了自己对媒介的理解；而通过阅读媒介批评文本，人们得到有关媒介的知识。然而视媒介批评为叙事的意义不仅如此，强调批评的叙事性，要求我们像用叙事理论分析神话、寓言一样，进一步分析这些知识背后的预设与逻辑，即媒介批评是如何来建构其对于媒介的理解的。

詹森（Jensen，1990）之所以认为媒介批评也具有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特性，就是因为他把媒介批评理解为更为一般性的话语，认为媒介批评动员并再生产了有关历史、文化、社会和技术的预设。在这里，话语指相互交叉的、自我认定的信仰系统，这些信仰对于理解过去、解释现在和预测将来意义重大。因此，当媒介话语以统一的社会叙事的方式运作时，也可以不出示外在的证据，因为社会叙事本身即具有说服力：他们征用并强化了那些想当然的预设。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叙事尤其难以分析、批评或超越。但是，